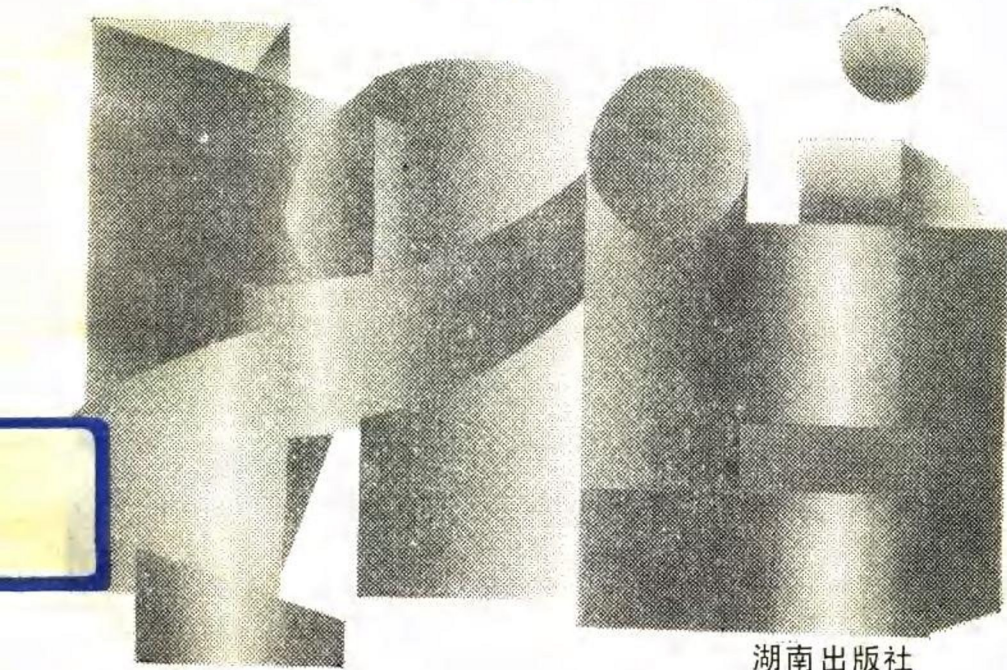


张培刚

发展经济学通论 第一卷

农业国

工业化问题



湖南出版社

张培刚
著

发展经济学通论

第一卷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

湖南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敬
装帧设计 贺旭

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

张培刚 著

责任编辑: 陈 敬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1

字数: 338,000 印数: 1—2,000

ISBN 7—5438—0076—4

平装:

F·10 定价: 6.20元

精装:

ISBN 7—5438—0077—2
F·11 定价: 8.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194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是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曾获该校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在国际上颇有影响。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直到1984年，中译本作为《农业与工业化》上卷，才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作者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中，向英、法、德、美、日、苏联诸国，寻求“产业革命”以来它们各自实行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并立足于农业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加以考察。

现在的新版(扩大版)，进一步对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也就是对“发展经济学”今后的研究方向、范围和方法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和看法。这些，都概述在新增添的总揽三卷的“总论”中。并且，鉴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正是“发展经济学”的主题，故将书名《农业与工业化》，改为《发展经济学通论》。此外，就本书第一卷而言，除第五章外，各章都在章末增加或补充了新的内容。

作者肖像



1947年4月



1985年冬

作者简历

张培刚(1913—),湖北红安人。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1934年夏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1941年考取清华公费留美,1945年冬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科博士学位。1946年夏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1947年兼任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委会顾问。解放初期任武汉大学校委会常委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1952年底调华中工学院,负责建校规划工作;后任社会科学部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及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从1979年起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理事长。

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OF INTELLECTUALS

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 Cambridge, Eng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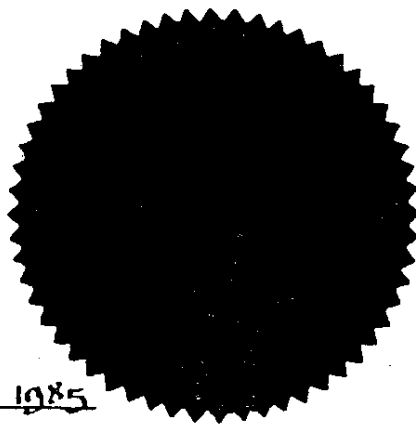
This Certificate of Inclusion
has been awarded to

Fei-Kang Chang

in recognition of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s which are recor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of Intellectuals

Volume Seven

Signed and sealed in Cambridge, England



Authorized Offic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

Date November, 1985

国际传记中心：《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

授予张培刚以荣誉成就证书（杰出成就认可证书）

1985年11月印发

总 论

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

——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

这个题目很大，我只想藉此机会谈谈自己的初步想法。其中有些想法是我几年前就已经考虑到的，有些则是最近才产生的。现在一并提出来，以供大家指正讨论。

(一) 问题的提出与回答：扩大研究范围 与改进研究方法

最近我读到一本新出版的书，名为《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是由董辅祁教授主编的《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的第一本，精心选译并刊载了1986年在美国召开的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第25届发展经济学年会上所提交的16篇论文。执笔者均为当代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知名学者：西方的有H·钱纳里，威廉·阿瑟·刘易斯，劳尔·普雷维什，西奥多·W·舒茨尔，安妮·O·克鲁格，G·拉尼斯等人；东方的有日本的

石川滋，美籍华裔教授费景汉(John C.H.Fei)等人。^①本书这些文章大都涉及到当代发展经济学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和近产生的一些特征与趋向，以及亚、非、拉美有关国家的一些经验和难题，是很值得向读者推荐的。

此书开头的一篇文章，就是耶鲁大学教授G·拉尼斯(Gurtav Ranis)写的，^②题为“发展经济学：下一步迈向何处？”首先，拉尼斯和费景汉在文中指出了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对“发展经济学”前途的一些悲观的看法，写道：

“近年来，学术界对发展经济学的状况似乎作出了异常多的痛苦的重新评价。对我们的沉闷科学的这个困难分支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作悲哀演说的人，包括有对这个学科的合法性表示怀疑的莱尔(D·Lal)，把发展经济学当作纯应用微观经济学的正宗分支的李特尔(I·Little)，以及认为我们已经在通往‘一神论’的途中自我毁灭了的赫希曼(A·Hirshman)。介乎这些看法之间，象通常一样，还可以听到象布鲁顿(H·Bruton)和斯特里顿(P·Streeten)这样一些人的较有节制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尽管也并不相同，但都是力劝我们既要保住孩子，又不要倒掉(大部分)洗澡水”。^③这里拉尼斯和费景汉把莱尔、李特尔、赫希曼作为提出了悲观看法的代表人。

接着，拉尼斯和费景汉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那些相

① 《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一书的中译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何家成、曹勇、杜海燕等一批青年研究工作者；校阅者为该所赵人伟教授。书中载有董辅初作为《丛书》主编所写的“序言”，以及几位译者为翻译和推荐本书所写的“代序”，都值得读者先行阅读。全书30万言，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② 依照中译本，这篇文章只标明是由G·拉尼斯一人写的；最近经过查对英文原稿，才发现此文是由G·拉尼斯与费景汉二人合撰的。特此补正。

③ 《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第3页。

信发展经济学死亡了的人们完全是言过其实”。但他马上又说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认识到，发展经济学正处在第二次大战后取得了重大进步之后的‘收益递减’阶段。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发展经济学中的智力生产函数将如何再一次移动，无疑都有自己的看法。”拉尼斯等又说：“大家公认，发展经济学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在80年代和90年代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应用的障碍都可能超过50年代和60年代。不过我相信可以做一件事而不冒风险，那就是申明：在过去的10年中确实已经取得了即便不是引人注目但至少是实质性的进步。”^①可见拉尼斯等对“发展经济学”的前途，虽然不象前面那些学者那样悲观，但却和西方经济学界的大多数人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是认为发展经济学“已在走下坡路”。具体而言，“发展经济学”到了70—80年代，已经不象50—60年代那样繁荣昌盛，而是由高潮转入了低潮，即所谓“收益递减阶段”了。

最后，拉尼斯和费景汉用全文的大部分篇幅，并冠以“政策变化经济学”及“结论和展望”两个小标题，对“发展经济学”下一步应迈向何处这一问题，综合回顾了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科研成果和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意见。简要言之，他们认为今后“发展经济学”应该从以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主，转向以研究“组织和政策的变化”为主。在文章的末尾，拉尼斯等进一步归结和展望说：“如果我们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本文就不能只限于指出我们这一分支学科的未来方向，政治进程——政策通过它不是适应就是阻碍经济体制走向现代增长——是问题的关键，自然资源和外国资本的作

① 《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第3—4页。

用也是如此。我们相信，通过类型学的分析，例如，把东亚的平稳发展和拉美的振荡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加以对照，就能够获得更大的进步。”^①

概括而言，拉尼斯和费景汉在文中的主要论点是：第一，认为那些相信发展经济学“死亡了”的人们完全是“言过其实”。第二，承认发展经济学在第二次大战后繁荣了一段时间之后，已开始走“下坡路”，当前正处于“收益递减”阶段。第三，要挽救这一局面，发展经济学下一步应该从主要研究“结构变化”转向到主要研究“组织和政策变化”。

综观拉尼斯和费景汉的文章，既指出了当前发展经济学遇到的难题和正在走“下坡路”的困境，又在综合他人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见解的基础上，排除了那种认为发展经济学已经或快要死亡的悲观看法，提出了今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应该是从以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主，转到以研究组织和政策的变化为主的解救办法。我们认为全文是讲求实际的，并且具有某些革新意义和富于启发性。但是我们又认为，单单这样，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也不能摆脱当前所处的困境。

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大不相同的，而认为应该对发展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按照我的理解，“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而现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上还占大多数。因此，发展经济学就其任务而言，仍然是极其有生命力的，可以说是“方兴未艾”，

① 《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第11页。着重号是引者加上的。

大有可为。但要做到这样，必须具有以下两个基本条件，或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造和革新。

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大都只是第三世界中实行市场经济即采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包括或没有详论第三世界中实行计划经济或采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中国家。就我手头上现有的五本比较通用而又闻名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或教材来说，只有1983年英文初版的由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德怀特·H·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等四位教授合撰的《发展经济学》^①论及社会主义中国的部分算是最多的；可能因为帕金斯教授本人就是美国知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著有多种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刊。其次要算是1983年发行的英文第四版由C·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和B·赫里克(Bruce Herrick)合撰的《经济发展》一书^②，以及1984年发行的英文第四版由杰拉德·M·迈耶(Gerald M. Meier)撰写的《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一书，也在有关的地方，对解放前后中国的经济情况和问题，作了一些论述。至于1980年第三次印行的由E·E·哈根(Everett E. Hagen)撰写的《发展经济学》一书，只在第三篇“增长的因素”的末尾“制度”(Institutions)一章内，用六页的篇幅以“中国

① 1985年秋，我赴美在纽约参加第二届“美国——亚洲经济关系会议”，会后赴麻省剑桥哈佛大学访帕金斯教授，他当即赠送我一本他们四人的近著英文本《发展经济学》。我回国途经上海，当即交由李荣昌、杨建文等青年研究工作者译成中文，我还约帕金斯为中译本写了一篇序言。中译本已由董辅初教授列为他主编的《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交由经济科学出版社排出版。

② 此书中文本(张欣、陈鸿仪等译)，于198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根据的英文本是纽约1977年第3版。

的制度和动力”为题(英文本第244—249页),简述了中国从解放后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期间的成就、失败和问题,并饶有新意地把中国从1949年解放后30年来的经济发展,比拟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可惜过于简略,更未能涉及中国近10年来经济大发展和体制大改革的问题。而1981年发行第二版的由M·P·托达罗(Michael P·Todaro)撰写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则根本没有提到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认为,既然是叫做“发展经济学”,那么不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各自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问题。因为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许多有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有关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題,大都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当然有些问题,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采行市场机制,并使这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则属于特殊而难以一时圆满解决的新问题,值得国际经济学界共同来探讨。如果这样扩大了研究范围,那么“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不就相应地跟着大大地扩展了而大有可为吗?

其二是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特别是要加强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

迄今为止,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中,也就是在亚、非、拉美实行市场机制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里,比较起来获得成功的就是闻名世界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即南朝鲜、新加坡、台湾、香港等所谓“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最近还有可能要加上第五和第六“小龙”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方面，确实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其它发展中国家研究和借鉴。但它们总的说来，毕竟幅员较小，人口较少。而且象新加坡和香港，只是城市而无农村；虽有制造业，但主要靠经营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发财致富，兴旺繁荣，其依赖于世界市场的程度极高。因此，它们作为世界典型的代表性是有局限的。至于另一方面，象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国，还有解放前的旧中国或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都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除巴西外，人均国民产值极为低下。可是它们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却大都是蹒跚踟蹰，难以稳定起飞和迅速发展。其原因安在？除了人口负担过重外，还有其它何种重要原因？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所不能回避而必须加以回答的问题。

回顾大战后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在西方经济学界蔚然兴起，一时学习研究成风，书刊层出涌现；尽管观点论点或相同，或相异，或大相径庭，但都极大地充实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其中有些论点和政策，如关于资本形成（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关于“二元结构”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关于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关于“国际大循环”和经济“起飞”等等，确曾对有些幅员狭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和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产生了具体效果；还可以说，对这一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或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和产生具体效果。但对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封建历史悠久、社会情况复杂的发展中国家，象印度、中国等国，则收效甚微。这就更需要我们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探根溯源，寻找良

策。如果对这一类型的国家，仍然停留在过去二、三十年来那样的研究方法上，单纯就经济论经济，那就将继续难以找到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途径，和难以找到解脱“发展经济学”所处困境的出路。

(二) 发展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

“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題。“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大战结束以前的40年代初期，甚至30年代末期。

关于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文，就我考查所及，最早的要算是威廉·吕彼克 (Wilhelm Ropke) 在1938年以法文所写的“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一文；^①稍后的就是P·N·罗森斯坦—罗丹 (P·N·Rosentstein-Rodan) 在1943年以英文所写的“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一文。^②而最早比较系统地探讨这一问题的专著，则是我本人于1945⁵年底在美国哈佛大学写成的博士论文，旋被该校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农业与工业化》一书。^③自后，有关经济落后国家、或欠发达国家、

① 吕彼克的文章，发表于法文《国际经济评论》，1938年7月号。

② 罗森斯坦—罗丹的文章，发表于英国出版的《经济学杂志》，1943年6—9月合刊。

③ 此书曾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重版。1984年，中文本作为《农业与工业化》的上卷，加上副标题《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1988年1月，中文版重版。

或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问题的书刊,就相继出现。其中比较知名的,在美国出版的有W·A·刘易斯(W·A·Lewis)的《经济成长论》,初版1955年;哈维·赖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的《经济落后与经济成长: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初版1957年;前述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的《经济发展》,初版1958年;艾伯特·O·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的《经济发展战略》,初版1958年;在英国出版的则有H·迈因特(Hla Myint,或译为H·明特)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初版1964年。60年代到70年代,以至80年代,研究发展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书刊,更日益增多,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几种最通用的教材外,还有一些知名的专著和有价值的论文,因限于篇幅,则不一一列举了。

我个人认为,“发展经济学”可以看作有广、狭二义。

就广义而言,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根据这一涵义,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研究的是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可说是最早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著作了。但称得上真正系统的“发展经济学”著作的,最早要算是马克思从1867年开始发表的《资本论》,全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趋于灭亡的必然趋势。以此为基础,还有当代美国进步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于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以及英国进步的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于1946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一书,都算得是广义的“发展经济学”著作。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已故著名的美籍奥国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他于1912年以

德文初版，1934年以英文修订版，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加上1942年又以英文发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两者都以他独有的“创新理论”为核心，分析和阐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认为最终资本主义也将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被“民主的”社会主义所代替。^①这当然也是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此外，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Rostow）于1960年发表的英文本《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②特别是其中的“起飞”和“起飞”阶段的理论，尽管后来对这方面的争论很多，但它对于发展经济学仍然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所以这本书也应当算是广义的“发展经济学”。

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称呼的发展经济学。如前所述，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酝酿准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而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題。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早在40年前，我在前述拙作中就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并说“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

① 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的中译本，已于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中译本，已于1987年脱稿，并由商务印书馆于1988年发排付印。

② 沃尔特·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英文本纽约1960年初版，1971年第二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部门的发展来表明”。当时我又指出，“上述工业化的定义，比大多数其他学者所用的定义或解释，要广泛得多。我们的定义可以表明已往两个世纪经济社会的主要变化，同时也可以将工业发展及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简言之，按照我的定义，“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①

可是战后二、三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大多数学者却对“工业化”采用了传统的比较狭隘的概念，以为实行“工业化”就是单纯地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而不顾及或不重视发展农业，把实行工业化与发展农业看作是相互对立的，认为实行其中一端，就不能或难以实行另一端，两者不能同时进行。这种看法和观点，早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占据了中央计划和政策的统治地位，以致长期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从而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在建国初期的“五年计划”中，仿效苏联模式，受到了同样的不利影响；后来有所认识和纠正，但一直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直到近些年来，有些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才开始对“工业化”的内容和作用，以及对实行“工业化”与发展农业的关系，作出了重新的认识和评价。比如杰拉尔德·M·迈耶，在前面提到的他的名著《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1984年第四版第六章“工业化战略”的开头，添加了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写道：

“这一章（工业化战略）应当和下章‘农业战略’结合起来阅读。因为一个发展规划不能只着重工业化而牺牲农业的发展。虽然许多欠发达国家，在它们的起初的发展计划中，都集中于

① 详见拙作《农业与工业化》中文本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第3章“工业化的理论”，1984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第70—71页；又见该书“结论”部分，第236页。